

宋大川 主编

北京考古史

明 代 卷

李永强 著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宋大川 主编

北京考古史

明 代 卷

李永强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序

记忆的历史，有着不同的“版本”，比如神话传说，比如民俗，比如历史文献，比如考古学遗存，等等。它们都记忆着历史，它们是历史记忆的不同“版本”。宋大川先生主编的这部十卷本的《北京考古史》，不仅是北京考古学史，也是考古学发现与研究考古学遗存所认识的北京史。例如其中《史前卷》中的《附表》，即《北京史前考古大事年表》，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北京史的历程，这就是北京的考古学史。因此，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北京考古学遗存所认识，或所表述的北京史，和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北京史的历程，即北京的考古学史，便是这部十卷本的《北京考古史》所涵盖的内容。这也是此书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这两史各自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使就一个人来说，也因时、因视角、因视点而异。我在此时此刻所要说的则是：

从北京的考古学史来看，我认为之所以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一靠考古学遗存即文物的保存与保护，二靠考古学的实践，三靠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没有考古学遗存即文物的保存与保护，不会有考古学。没有考古学，哪来的考古学实践？没有考古学实践，哪来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所以考古学要存在，要发展，就得做好考古学遗存即文物的保存与保护。

同时，应指出的是，考古学史既有横向延展的历史，又有纵向发展的历史。移用现有的或他人、异地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进行遗存的研究，即使有新发现，产生了历史的新认识，也只能称之为考古学的发现史。如果考古学仅停滞于这一层面，那么，它展现的历史，便只能算是考古学发现史，即考古学史中横向延展的历史。只有推进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考古学才能既出现横向的延展，又呈现纵向的发展。既有横向延展、又呈纵向发展的考古学史，才是全面的考古学发展史。这样的考古学发展史，应是中国考古学人的追求。当然，我希望北京的考古学人以此作为自己的追求。更需要指出的是，考古学的实践，虽是推进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更新的前提，但要实现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创新，则需勤于在考古学实践中增加一个“悟”字，这也是我对北京考古人的一点希望。

至于文物保护与考古学发展应当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个人历来主张应该是良性互动和推进考古学的持续发展。我们应知，只有持续的文物，才能有持续的考古学发展。因此，这两个持续当是我们的追求。从这十卷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所认识的北京史

来看,一是我看到了北京考古学的成就,二是从当前文化建设来考虑,北京史本身确实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摆在我面前的不是两三卷,也不是四五卷,而是长达十卷本的北京史。这篇幅巨大的北京史,体现了北京考古学成就的巨大。

这体现了北京考古学人巨大成就的北京史,引起了我们哪些思考?

一是要理解北京史,就得明白北京所处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环境。北京处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地当东北平原、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交界处,是面向欧亚大陆的中国西半部和面向海洋的中国东半部的连接地带。这就是北京所处的这两类地理环境的位置。

二是北京是猿人演进为现代人的地区,很可能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转化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地区。关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问题,暂无人涉及。因此,暂难言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问题。打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北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族群文化的文化品性,存在如下应注意的文化现象:

其一,从新石器时代起,可以认为北京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或任何一种族群文化,就其文化构成来看,都是以一元为主的多元谱系的文化结构,即杂种文化。这种杂种文化乃是不同谱系的文化杂交产生的。所以出现文化杂交,乃是文化碰撞与交流的结果。

其二,北京是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或族群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和争夺的地带。有时,北京存在多种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族群的文化割据并存的局势。有时,北京局部地区出现了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族群文化的更替。有时,整个北京地区出现了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族群的更迭。同一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或族群文化延续时间之短,和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或同一族群文化更迭频率之快,乃是北京文化演进的一个特点。

其三,西周封燕,是北京历史上出现的大事。所以是大事,一是开始将北京纳入中国的政治版图,二是出现了政权和文化的新关系。西周早期,周王朝(或燕国)政治版图或政权统治所及,仅限于北京部分地区。在这部分地区内,文化则是多元的。到西周中期,燕国政治统治涵盖了整个北京。此种现象,相对于此前的文化“一本多元”来说,我们称之为“一统多元”,即政权一统,文化多元。直到春秋晚期,才出现了政权与文化的“一统一元”,即政权统一,文化一元。自此以后,这种“一统一元”和“一统多元”的更替,一直延续到现代,这是北京政治与文化的一个特点。同时,需指出的是,“一统多元”下不同文化或族群的居民,既存在聚居,又存在杂居的现象,就聚居和杂居关系而言,又存在大聚居、小杂居,大杂居、小聚居和聚居、杂居难分秋色等不同情形。这是北京“一统多元”政治与文化的另一个特点。这两个特点,是我们论北京史者必须纳入眼帘的。

三是北京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步伐,大致同全国的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步伐一致,即经历了中国的北京、亚洲的北京和世界的北京三大时期。所谓世界的北京,说的是北京自明代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这使北京成为了世界的北京。除少数年代外,因为北京是这个时期中国的首都,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故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时的北京处于漩涡中心,走过的道路磕磕碰碰,跌跌撞撞,迂回曲折。现在该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

了，该冷静下来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了。什么是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就是我以往讲的“传承、吸收、融合、创新”这八个字。所谓“传承”，是传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所谓“吸收”，是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所谓“融合”，是将这两种优秀文化融合起来，如“中体西用”、“中西之间”和“西体中用”等等；所谓“创新”，就是在“融合”的基础之上，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创造出新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乃是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这是被恩格斯所肯定的。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中，恩格斯指出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文化在史前社会中就已存在，并呼唤在“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以“更高级形式”复活这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文化。其实对中国来说，这种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文化，也不是什么舶来品，这种文化已经以初级的形式存在于我国古代的氏族制度中，不过在我国由氏族制度社会发展为文明社会的过程中逐渐被民本思想和更恶劣的专制文化代替了，除保留一点痕迹外，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尘封在历史的博物馆中。是恢复我们记忆的时候了！是从西方的文化中学习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的时候了！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来到中国大地时，中国文化的特色不会消失，而将如苏秉琦所说的那样，仍是世界文化中的一个相对独立区系，和世界文化的关系则如费孝通所讲，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此时中国文化方显出勃勃生机。

是以序。

張若培

12—4—22 皮影給小石屏

前　　言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延续未曾间断的历史名城,有着数十万年的人类居住历史,3 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50年的建都史。漫长的发展岁月中这里积淀了极为广博深远的文化遗存,它们是北京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代表性文物遗迹,是数千年来北京从最初的原始聚落发展到今天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物证,而这些历史的印迹只有一部分见于文献典籍,绝大部分则尘封于地下,需要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去再现。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地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成绩卓然,展示了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构建和诠释北京地区社会发展历史与城市变迁历史方面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

如果从1927年周口店遗址的发掘算起,北京地区的史前考古已经走过了80余年的历程,基本建立了北京地区史前考古的文化序列。周口店遗址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及猿人使用的石器和用火遗址,证实50万年以前北京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其创造出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对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地区的史前考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除继续对周口店遗址进行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外,还新发现了一批史前文化遗存,获得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对推进北京地区早期人类及其文化演进历程的探讨具有重要作用。据统计,北京地区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石器出土地点约48处,新时器时代的遗址、墓葬和零散遗存点约4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在北京城区和多个郊区,共同构建了北京地区史前历史发展的脉络,为认识北京地区史前文化结构和研究不同史前文化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北京地区的历史时期考古内容丰富,在反映北京文化内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北京地区三代考古的重大贡献是为西周初年封立“燕”、“蓟”二国及“燕”、“蓟”古城的探讨提供了实物资料。琉璃河遗址发现的燕都古城以及大量西周时期墓葬、车马坑和带有燕侯铭文的众多青铜礼器,印证了文献所载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和封召公于燕是信史,同时也弥补了文献记载的匮乏及不确定性,笼罩在北京古都城市历史起源上的迷雾正在廓清,“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愿望正在实现。而“玉皇庙文化”的发现则表明东周初年及春秋时期,北京地区始终存在着南北两个不同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即位于北京南部的燕文化和位于北部燕山山地间的“玉皇庙文化”。“玉皇庙文化”的发现独立地回答了文献资料所无法回答的历史问题,进一步展现了通

过考古学构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历史的可能。

北京地区秦汉及其以后各个历史时期也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对北京史的认识。北京地区秦汉古城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为研究秦汉时期的郡县制度和北京地区早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增加了资料。北京地区城市考古调查与研究的开展,基本究明了北京名城各时代的历史发展系列。古蓟城、西晋蓟城、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等城市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为研究北京城市的发展演变和城市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大量极为重要的、科学的史料,考古调查与研究所获的有关城池、建筑、街巷道路、宫殿苑囿、手工业生产作坊、城市的河湖水系等各种实物资料丰富了北京史研究的内容。

金代皇陵、明定陵、清代园寝等帝王陵墓考古所取得的诸多重要成果,使人们对陵园分布、陵园布局、陵寝建筑、陵邑形制等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对于研究陵寝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也为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汉代以降各个历史时期的一般墓葬的发掘,数量更是惊人。大量墓葬的清理及相关的墓葬考古研究,丰富了相关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资料,促进了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历史研究,起到了考古补史、证史的作用。

北京地区的历史时期考古以实物资料串联起了北京历史发展的链条,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北京城市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经济、文化状况、社会生活和生产发展水平,不断地为我们对北京古代社会不同阶段城市发展的认识增加新的内容,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北京社会发展史的历史文化内涵。

北京考古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与反思是北京考古工作者的职责与义务,及时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北京考古工作的发展过程,同时也能在回顾与前瞻、反思与总结中不断明确北京考古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组织编写了这部十卷本的《北京考古史》,希冀对北京考古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为促进北京考古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本书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集体研究成果,并拥有全部著作权。宋大川作为主编,做了策划、组织和审稿工作;夏连保作为副主编,协调了本书的编写事务;史前卷由郭京宁著,夏商周卷由张智勇著,东周卷由王继红著,汉代卷由胡传聳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由董坤玉著,辽代卷由于璞著,金代卷由丁利娜著,元代卷由孙勐著,明代卷由李永强著,清代卷(上)由朱志刚著、清代卷(下)由张中华著。

本书史前卷由吴加安先生审稿,夏商周卷由赵福生先生审稿,东周卷由靳枫毅先生审稿,汉代卷由信立祥先生审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由乔梁先生审稿,辽代卷由齐心先生审稿,金代卷由陈平先生审稿,元代卷由魏坚先生审稿,明代卷由荣大为先生审稿,清代卷由李建平先生审稿。

特别要感谢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先生奖掖后学,欣然为本书作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先生大义,吾侪铭刻于心。

诚然,《北京考古史》的编写只是个初步的尝试,不足之处很多,许多问题还需进一步讨论,我们真诚地希望抛出这块粗砖,引来众多有识之士的美玉,从而快速推进北京考古研究的发展。

宋大川

二零一二年五月

目 录

序.....	张忠培 (1)
前 言.....	宋大川 (1)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明代北京的沿革.....	(1)
第二节 北京明代考古的发展.....	(2)
第三节 北京明代考古的研究现状.....	(6)
第四节 北京地区明代考古学的特点.....	(9)
第二章 北京城垣.....	(11)
第一节 内城城垣.....	(12)
第二节 外城城垣.....	(13)
第三节 皇城.....	(14)
第四节 紫禁城.....	(16)
第三章 陵寝.....	(22)
第一节 十三陵的勘察.....	(22)
第二节 定陵.....	(25)
第三节 其余各陵.....	(28)
第四节 十三陵主神道.....	(33)

第四章 墓葬	(34)
第一节 嫔妃墓.....	(34)
第二节 皇子墓.....	(38)
第三节 公主墓.....	(41)
第四节 太监墓.....	(44)
第五节 外戚墓.....	(57)
第六节 品官墓.....	(64)
第七节 平民墓.....	(77)
第五章 长城与京杭大运河	(83)
第一节 长城.....	(83)
第二节 京杭大运河.....	(97)
第六章 宗教遗址	(102)
第一节 寺庙遗址.....	(102)
第二节 宗教徒墓地.....	(111)
第三节 塔.....	(114)
第七章 摩崖石刻和造像	(116)
第八章 窟藏	(124)
第九章 其他遗址	(133)
第一节 琉璃窑址.....	(133)
第二节 矿冶遗址.....	(133)
第三节 石桥遗址.....	(134)
第四节 京畿州、县故城	(136)
第五节 壁画.....	(139)

插 图 目 录

图一 明代北京城平面图.....	(11)
图二 明代北京城内城西城垣剖面图.....	(12)
图三 东皇城根遗址T9北壁剖面图	(14)
图四 皇城西南转角遗址全景.....	(15)
图五 过水涵洞遗址全景.....	(15)
图六 紫禁城西华门北段城垣基槽.....	(17)
图七 紫禁城西华门北段城垣基槽平、剖面图	(17)
图八 紫禁城西华门北段城垣排水沟.....	(18)
图九 徐苹芳、张忠培等专家验收现场	(18)
图一〇 紫禁城廊下家礓碴遗址.....	(19)
图一一 紫禁城廊下家窖池遗址.....	(20)
图一二 紫禁城廊下家窖池遗址出土的模印方砖.....	(20)
图一三 青花五牛图碗.....	(20)
图一四 青花缠枝花卉纹碗.....	(21)
图一五 青花罐盖.....	(21)
图一六 明十三陵分布图.....	(23)
图一七 明十三陵石牌坊.....	(24)
图一八 明十三陵主神道.....	(24)
图一九 明十三陵石象生.....	(24)
图二〇 长陵平面图.....	(25)
图二一 定陵鸟瞰.....	(26)

图二二 定陵地宫平、剖面图	(26)
图二三 定陵地宫	(27)
图二四 定陵出土乌纱翼冠	(27)
图二五 定陵出土金翼善冠	(27)
图二六 定陵出土六龙三凤冠	(27)
图二七 长陵祾恩殿外景	(28)
图二八 景泰陵碑亭	(32)
图二九 景泰陵石碑	(32)
图三〇 景泰陵宝城	(32)
图三一 郑贵妃园寝平面图	(35)
图三二 董四墓村M2平面图	(36)
图三三 军事科学院明皇子墓平面图	(40)
图三四 军事科学院明代皇子墓出土青花梅瓶	(41)
图三五 海淀香山太监刘忠墓平、剖面图	(45)
图三六 地质力学研究所出土龙纹玉带	(46)
图三七 工商大学1号墓出土瓷瓶	(47)
图三八 工商大学2号墓出土玉带	(48)
图三九 工商大学2号墓出土石俑	(48)
图四〇 北京射击场M130出土金嘎乌	(49)
图四一 北京射击场M31出土玉饰	(49)
图四二 北京射击场M85出土青花瓷罐	(50)
图四三 北京射击场M176出土青花瓷罐	(50)
图四四 北京射击场M163出土瓷罐	(50)
图四五 北京射击场M24出土玉带	(50)
图四六 北京射击场M130出土玉带	(50)
图四七 北京射击场M31出土骨管状器	(50)
图四八 北京射击场M4平、剖面图	(51)
图四九 北京射击场M4	(52)
图五〇 北京射击场M17平、剖面图	(52)
图五一 北京射击场M155平、剖面图	(53)
图五二 北京射击场M6出土玉带	(53)
图五三 南苑苇子坑明墓剖面图	(58)
图五四 李文贵墓出土金玉耳坠	(60)
图五五 李文贵墓出土金玉珠宝花簪	(60)
图五六 李文贵墓出土金耳坠	(60)

图五七	李文贵墓出土金耳钉	(60)
图五八	李文贵墓志盖	(61)
图五九	西客站南广场M15出土玉带	(61)
图六〇	西客站南广场M15出土青花罐	(62)
图六一	西客站南广场M16西棺出土玉带	(62)
图六二	西客站南广场M16东棺出土玉带	(62)
图六三	西客站南广场M16出土玉带钩	(63)
图六四	西客站南广场M16出土玉饰	(63)
图六五	西客站南广场M16出土青花罐	(63)
图六六	施聚家族墓M2出土玉带	(64)
图六七	施聚家族墓M2出土银质冥币	(64)
图六八	施聚家族墓M17	(65)
图六九	施聚家族墓M17出土玉带	(65)
图七〇	施聚家族墓M17出土铜镜	(65)
图七一	施聚家族墓M12	(66)
图七二	施聚家族墓M12出土玉带	(66)
图七三	施聚家族墓M12出土铜镜	(66)
图七四	赵胜夫妻合葬墓平、剖面图	(67)
图七五	赵胜夫妻合葬墓出土白瓷罐	(68)
图七六	赵胜夫妻合葬墓出土银元宝	(68)
图七七	赵胜夫妻合葬墓出土玉带	(68)
图七八	赵胜夫妻合葬墓出土玉带线图	(68)
图七九	赵胜墓志盖拓片	(69)
图八〇	赵胜墓志拓片	(69)
图八一	朝阳三间房明墓墓志出土时的状况	(70)
图八二	昌平小汤山M4	(78)
图八三	昌平小汤山M4出土的铜镜	(78)
图八四	昌平小汤山M5	(79)
图八五	昌平小汤山M5出土的铜镜	(79)
图八六	平谷区马坊镇河北村M9	(82)
图八七	八达岭长城——北路北四楼	(84)
图八八	八达岭——烽火台	(84)
图八九	司马台西14台	(85)
图九〇	司马台西16台	(85)
图九一	火焰山营盘遗址鸟瞰	(88)

图九二 火焰山营盘遗址平面图	(89)
图九三 京杭大运河银锭桥	(98)
图九四 东不压桥东侧金刚墙及拱券石	(98)
图九五 东不压桥东侧燕翅	(99)
图九六 玉河堤岸遗址护桩	(99)
图九七 玉河堤岸砌砖铭文	(99)
图九八 玉河码头遗址	(100)
图九九 排水道出水口	(100)
图一〇〇 排水道水篦子	(100)
图一〇一 应梦寺遗址全景	(102)
图一〇二 应梦寺主殿	(103)
图一〇三 应梦寺西殿平、剖面图	(104)
图一〇四 应梦寺西殿雕花砖	(105)
图一〇五 应梦寺西殿雕花砖线图	(105)
图一〇六 应梦寺西殿雕花砖拓片	(105)
图一〇七 应梦寺西殿佛像	(105)
图一〇八 应梦寺殿3佛像	(106)
图一〇九 应梦寺主殿石佛像	(108)
图一一〇 利玛窦墓地	(111)
图一一一 利玛窦墓碑	(112)
图一一二 利玛窦碑文	(112)
图一一三 姚广孝墓塔	(113)
图一一四 石佛村摩崖造像	(117)
图一一五 圣水峪石造像	(117)
图一一六 圣水峪题记	(118)
图一一七 西山凤凰岭玄元洞石造像	(121)
图一一八 汉白玉外石函	(122)
图一一九 汉白玉外石函铭文	(122)
图一二〇 汉白玉舍利函	(122)
图一二一 汉白玉舍利函铭文	(123)
图一二二 白玉舍利函及舍利	(123)
图一二三 毛家湾瓷器坑	(124)
图一二四 瓷片出土时的状况	(124)
图一二五 毛家湾出土的红绿彩鱼纹碗	(125)
图一二六 毛家湾出土的抚琴人物图青花盘	(125)

图一二七	毛家湾出土的孔雀牡丹纹青花罐	(125)
图一二八	毛家湾出土的青花炉	(125)
图一二九	毛家湾出土的磁州窑人形小哨	(126)
图一三〇	毛家湾出土的青瓷罐	(126)
图一三一	毛家湾出土的青瓷花盆	(126)
图一三二	毛家湾出土的青瓷盆托	(127)
图一三三	毛家湾出土的青瓷高足杯	(127)
图一三四	毛家湾出土的青瓷盏托	(127)
图一三五	毛家湾出土的钧釉碗	(127)
图一三六	毛家湾出土的钧釉盘	(127)
图一三七	毛家湾出土的建水窑青花盘	(127)
图一三八	毛家湾出土的“正德年制”款青花碗	(128)
图一三九	紫竹院出土的青花加彩小罐	(129)
图一四〇	北京四中出土釉里红瓷片	(131)
图一四一	北京四中出土白釉瓷片	(131)
图一四二	北京四中出土青釉瓷片	(131)
图一四三	巩华城南门匾额	(137)
图一四四	巩华城北门	(137)
图一四五	法海寺壁画	(139)
图一五六	法海寺壁画(局部)	(139)
图一四七	智化寺壁画	(140)
图一四八	大慧寺壁画	(141)

第一章 緒論

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19世纪末叶，随着“西学东渐”，近代考古学开始传入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产生了自己的考古学，至今已近百年。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取得了辉煌成就。

北京作为近现代中国的第一大都会，历史积淀深厚，文化遗存丰富，学术机构众多。近百年的学术积累，使得北京地区的考古成就已蔚然可观。就明代考古而言，北京地区具有开展早、起点高、学术价值大等特点。

本书可视为北京明代考古学史，也可视为北京明代考古发现与研究。将考古发现与研究逐项介绍清楚，正是考古学史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好在这段历史并不长，我和我的同事又是亲历者，“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本书要做的就是及时、如实地记录而已。

第一节 明代北京的沿革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派徐达攻占元大都，宣告元朝统治的灭亡。同年，明朝改大都为北平府，下辖通州、霸州、漷州、涿州、蓟州等五州十一县。洪武二年三月，设立北平行省，洪武九年又改为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永乐帝以北平为行在所，革去布政司，升北平为顺天府。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

自1421年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北京成为明代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224年。明代经济高度繁荣，在统治者对首善之区的长期经营下，明北京城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又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峰。

明王朝营建的北京城以及十三陵，毋庸置疑是明代考古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诸王、公主、妃嫔、太监、外戚以及百官臣工、商贾缙绅、文人士子的墓葬，无论是规格还是数量，都要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统治者们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营建兴造大批宫殿、苑囿、寺观、园林、衙署、离宫、坛庙、府库，以供他们处理政务、举行宗教仪式、游玩宴乐；而整治漕运、修建长城，更是牵动全国、影响深远之举；统治者们还利用各种官办手工业或通过海上贸易等方式，搜刮占有大量的奢侈品，以满足他们的奢靡生活。

以上种种,都是北京地区明代考古的重要内容。北京这座古都遗留下来的明代遗存,是全国等级最高、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特征最典型的,是明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集中体现。

第二节 北京明代考古的发展

通过对北京明代考古的回顾,参照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北京明代考古学史大致可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

一、金石学阶段(17世纪中叶~19世纪末叶)

明朝灭亡后不久,知识分子就开始总结前朝兴亡。顾炎武所著《昌平山水记》据他6次拜谒明陵而作,对十三陵做了详细记载。谈迁《北游录》一书中,对北京西郊金山上的明代高规格墓群有过记录。清康熙时,梁份撰《帝陵图说》对十三陵记述详尽,图文并茂。清朱彝尊著《日下旧闻》42卷,记有大量明时北京旧迹,搜罗广博,考证详明。记录明时北京旧迹的名作还有《春明梦余录》,列叙城池、官署、石刻、陵园等。

这一阶段,记录北京明代遗迹的著作较多,专门记录北京地区明代遗物的著作较为少见。这一阶段的学者,虽尚未摆脱金石学的传统,但他们中的优秀者已不局限于在书斋中著录和考证,而是注重实地考察。上述古籍,内容涉及宫殿、城垣、墓园、陵寝、石刻等等,成为北京明代考古中某些专题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

二、考古学萌芽阶段(20世纪初叶~20世纪中叶)

20世纪上半叶,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营造学社的学者们最先运用学自西方的勘测记录方法,开始调查研究明长城以及十三陵等。因为他们的方法主要来自建筑学,所以他们颇具开创性的工作仍不能视为明代考古学的诞生,而只能看作是考古学的萌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以地层学、类型学为标志的考古学已在中国形成,但对北京明代考古而言,真正考古意义上的发掘仍然没有出现。直到1951年,北京明代考古才迎来了第一次科学发掘——董四墓村嫔妃墓的发掘。因此,萌芽阶段以20世纪中叶为界。

此阶段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明北京城、明长城、十三陵等三个领域。如研究明北京城的有奉宽的《燕京故城考》^[1]、单士元的《明代营造史料》^[2]、朱偰的《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3]以及《北京外城创建考略》^[4]等;研究明长城的有《明代边墙沿革考略》^[5]、《明代

[1] 奉宽:《燕京故城考》,《燕京学报》1929年5期。

[2] 单士元:《明代营造史料》,《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年4卷1期。

[3] 朱偰:《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图书季刊》1947年6月新8卷1、2期。

[4] 非繁:《北京外城创建考略》,《北平晨报艺圃》1935年。

[5] 李漱芳:《明代边墙沿革考略》,《禹贡》1936年5卷1期。